

□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活动,有故意不上课者,有围逼教授停课者。教授们苦口婆心地劝导,终究不过各地学生涌赴南京请愿热潮的影响,教育部一再电令禁阻亦无济于事。张学良副司令也告北平各校同学,劝阻学生请愿,可这时候的学生怎么能听得进去呢?

尽管请愿风潮闹得风风火火,但绝大部分教师仍坚持上课,因此学校教学秩序未受过分冲击。正如梅贻琦校长在新学期

开学典礼上所说:“过去一年间,正值国难临头,风云紧急的时期。但国势虽如此危急,本校教务功课各方面,均尚能正常进行,未因时局关系而致稍有停滞。”梅校长勉励同学们,在新学期努力从事实上研究怎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救国的方法,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正是在梅校长这种思想的指导和鼓励下,清华师生开始加紧了防毒面具和航空等方面的研制工作。

抗战救国的时代强音：西南联大与战时国际广播

○戴美政

编者按 戴美政,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师大特聘研究员、云南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从事西南联大历史、文化研究多年,成果丰硕。本文是他最新的成果。为完成此项研究,他在云南省档案馆,调阅“昆明广播电台档案”共150余卷,逐页查检,摘录30余万字。本文所

引内容均出自该档案,限于篇幅,不再逐条注释。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爱国人士运用广播武器宣传抗战、促进民族觉醒、进行国际交流、推动抗日救国的特殊历史阶段。1940年8月1日开播的昆明广播电台,是为抗战国际宣传而建立、战时中国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除国语广播外,该台先后开播的外语节目有英语、法语、缅甸语、越南语、日语、马来语、泰语等,汉语方言节目有粤语、厦门语、台湾语、沪语等四种。其中,西南联大师生参与或主持编播的外语节目有英、法、日、马来语四种,汉语方言有粤语、厦门语、台湾语等三种。昆明广播电台借助西南联大的思想、学术、人才的优势,全力进行反侵略的电波战,办出了中国抗战广播的高水平,为抗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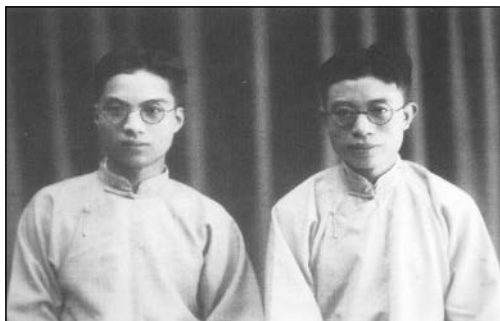
昆明广播电台大发音室现貌,戴美政摄于2015年1月23日

昆明广播电台建成开播

全面抗战开始以前，中国当局十分重视发展广播这一新兴传媒工具，1937年初筹划建立全国广播网时，中国西部仅有5座广播电台，总功率仅十余千瓦，远远不能适应宣传需要，因此决定在昆明、贵阳等西部城市筹设新的广播电台。经多方权衡，当局选中云南省首府昆明作为建立强力电台的地址，是“以昆明地处西南边陲，且为通过国际路线之要隘，故决定为设置强力广播电台之据点”，“以资宣传，而利国防”。这就清楚表明在昆明建立强力广播电台的原因、目的和主要任务。

1938年3月，中广处处长吴保丰和中央电台总工程师刘振清带领技术人员分别从武汉、重庆到达昆明，两人分任昆明电台筹备正副主任。两年间经历种种曲折，终于建成试播。1940年8月1日，战时中国功率最大、50千瓦的广播电台——昆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呼号XPRA，波长435米，频率690千赫，电台运作正常后，每日播音5个多小时，以后逐步增加到7小时。在40年代抗战最艰难时期，成为轰动省城和影响中国宣传界的大事，备受各方关注。

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的主要任务，是与重庆的国际广播电台配合，专司抗战国际宣传并兼顾国内。而具体到每一种外语及汉语方言广播的开办，均是为抗战国际宣传而设立，均与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的变化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有关。英语节目的设立，出于最大程度争取盟国的国际援助；法语节目的设立是应对东南亚是法国势力范围的现实；越南语节目设立于日本进占越南北部以后；日语、缅



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达元（右）与杨业治（左）早年合影（吴庆宝提供）

甸语、泰语、马来语设立于日军侵入缅甸、进而侵占东南亚、中国远征军赴缅抗日之时；粤语、厦门语、沪语节目的设立，是考虑到南洋侨胞中广东、福建、上海籍侨胞较多的现实。而出于抗日救国、唤起民众的舆论宣传的紧迫需要，这些节目从创办时起，就与西南联大的爱国师生结下不解之缘。

高葆光自荐英语播音

1940年5月，昆明广播电台试播，这新兴的广播传媒顿时吸引了众多的向往者。5月20日，西南联大政治系学生高葆光兴冲冲地写了中英文自荐信各一份，呈交该台筹备处。信中说：“贵台现已开始播音，闻之不胜雀跃，盖无线电广播对于民众教育宣传有重大关系”，“敝人渴望为电台英语报告员多年矣，对英文有甚深之兴趣，且有特殊研究，愿意接受任何面试”，等等。因当时还未及考虑接收英语播音员之事，6月5日，该台批复致函高葆光说：“俟日后正式成立时，再函约面洽。”两个月后，1940年7月20日，昆明广播电台致函高葆光来台面谈，经面试，高葆光终于如愿以偿，

□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1940年11月29日，昆明广播电台致吴达元聘任函

7月26日进入昆明广播电台为试用助理，因此，英语节目播音最初应由高葆光播音。

英语节目最早开播

1940年8月1日起，昆明广播电台的《英语新闻》开始播音，每晚9时播出（周六除外），每次10分钟，这是该台最早开播的外语节目。但高葆光毕竟太年轻，所学也非英语专业，难以单独承担如此重任。经多方物色，该台于9月26日聘请英语教育家、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校长水天同（1923—1929 清华学校）担任英语编播，同时聘请曾留法17年、时任云南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王士魁担任法语编播。水、王两人分别在8月下旬、9月上旬到该台试播后，被正式函聘为特约干事，分别负责编撰播出英语、法语稿件，每月各付津贴200元。水、王两人10月1日正式就职。昆明广播电台改订的节目时间表也在此时实行。

水天同是著名英语教育家，昆明广播电台礼聘之时，正值水天同与吴可读（英

籍）、美国学者温德、吴富恒等中国正字学会会员创办的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开学之际（吴可读、温德当时均为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作为该校校长，水先生校务异常繁忙。1940年10月实行新节目时间表后，英语节目增加为每晚15分钟，并增加了英语时评内容。1941年12月，英语节目奉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以下简称“中广处”）之令于12月19日起停播，改为转播国际台英语节目。水天同也自然离开该台。

1943年，该台英语节目主要是转播国际广播电台英语节目。1944年3月，昆明广播电台节目再次调整时方恢复英语自播节目。1945年8月抗战胜利，该台英语广播再次调整，除保留每周两次的英语谈话外，每晚9时定时转播国际广播电台15分钟的英语新闻，另外在三小时美国新闻处编排播出的节目中，有半小时的英语新闻。此时每周英语节目已达335分钟，可说是英语广播的全盛时期，这段时间有西南联大外文系教员王佐良，每周撰写英文时评一篇在该台播出。

法语节目几起几落

1940年7月，昆明广播电台筹备处开始筹划法语节目，呈请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准调中法教育基金会秘书陈廩准备担任法语播音。该台正式播音后，法语节目于1940年10月1日开播，播音员除王士魁外，又聘另一位熟谙法语者张家恭和西南联大讲师陈定民担任，但王、张两人不久即辞职。该台于当年11月又聘联大外文系教授吴达元担任此职，与陈定民轮流播出法语节目。陈、吴两人均为当时法语专家。陈定民是

浙江绍兴人，早年就读于北平孔德学校、中法大学，1934年赴法留学，后获巴黎大学语音学院文科博士学位。兼任昆明电台编播职务期间还任云南大学教授。他讲课条理清楚，法语语音纯正，著有《法文读本》、《法语语音学》。吴达元是广东中山人，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读研究院，1930年赴法国留学，后获里昂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联大时期著有《法国文学史》。昆明电台法语节目由两先生主持可谓得人。

1942年8月，陈定民因稿件审阅之事与昆明电台未协调好，当年9月双方解除聘约。同时，该台设法聘得中法大学生物系主任夏康农教授为特约法语播音员，于10月4日由夏康农继续播出法语节目。1943年6月，因夏康农辞职，法语节目遂停播。后经法国驻华新闻处与中方多次协商并报中广处批准，昆明电台于1945年8月恢复法语节目。由该台聘请法方介绍的法籍刘保环教授为播音员，广播内容以宣传中国对日反攻及建设工作为主。

日语节目颇费周折

昆明广播电台每一种外语节目的增设，均与国际局势的变化紧密相关。1942年1月，日军占领缅甸南部，急速向仰光推进。缅甸局势万分危急，中国政府按照《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组建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入缅抗日。此时，昆明广播电台按中广处指令加紧筹划缅语节目，该节目随即在1942年10月1日开播。与此同时，增设日语、马来语、泰语、台湾话节目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经多方努力，1942年10月，分别聘得日语播音员刘兼善、刘祚昌（联

大政治系学生），马来语播音员黄克峰（联大化学系学生），泰语播音员张业芬和台湾语播音员黄曾赐（联大生物系学生），他们均于当年10月这些语言节目开播时就任其位。

1942年10月，日语节目开播，最早的日语播音员是金佑卿。金任职时间不长，以后该台聘得刘兼善为特约专员，专负日语编播之责。刘兼善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中山大学、陆军大学教授，被称为“对国际政治问题研究造诣颇深”，加上西南联大政治系学生刘祚昌的协助，因此开播初期日语节目运行尚属正常。刘祚昌是东北人，日本占领东北期间学过日语。1943年4月，刘祚昌因病辞职，刘兼善一人难以维持该节目，该台“经多方物色迄今尚无此项人才”，只好于4月15日呈报中广处。4月27日，中广处回函说，日语播音员已呈请中宣部对敌宣传委员会代为物色，当前日语播音乃须依仗刘兼善。1944年10月，该台奉



1940年11月28日，中广处就增聘陈定民等人致昆明广播电台函

□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令增办知识青年从军节目，遂将日语节目改为知识青年从军节目。此项应急宣传任务过后，日语播音仍需恢复。但此时刘兼善因故请假离开，眼看该节目只能停播下去了。

1945年初，该台聘得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简焯波，带领哲学心理学系二年级学生金安涛、机械系一年级新生宁世铨承担了日语节目的收听、编译、播音任务。师生三人满怀爱国热情尽心工作，该台对三人也“当称满意”。但是简焯波因课业关系到当年4月不能继续编播，金、宁两同学也因学业紧张难以久留。1945年2月，该台再次呈报重庆告急。5月3日，中广处通知昆明电台说，经中宣部对敌宣传委员会批准，与军政部俘虏集中营洽妥，派日俘两人、指导员一人，到昆明电台担任日语播音员。所说的指导员为钟咏零，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科毕业，此次作为中宣部对敌宣传委员会派驻昆明广播电台担任对日宣传指导事宜，实际就是编选审核播音稿，监督两名日俘播音。两名日军俘虏一为尾崎於太郎，一为森山光彦。这样，在中国军队和盟军对日军事行动更加扩大，急需进行心理攻势的境况下，昆明广播电台的日语播音终得继续进行。

联大学生与马来语节目

1942年10月开播的马来语节目，由联大化学系二年级学生黄克峰担任编播工作。马来语节目起初每周播音三次，1943年2月因局势需要增加到每周六次，于是又增聘联大经济系学生陈犀峰为播音员，黄、陈两人一直工作到1944年4月，因抗日前线需要征调为译员投身军旅。再由联

大社会系二年级学生黄宗英继任，但黄宗英次年1月也考入译员训练班，其职便推荐自己的同班同学社会系学生李和清继任。这几位联大学生均是福建籍的华侨青年，怀抗日救国之志受聘该台。如黄宗英原侨居荷属爪哇岛，为抗日于1940年回国，就读于国立重庆华侨中学，毕业后考取西南联大，此期间应聘为该台马来语播音员。但他并不依恋该台相对稳定的生活，1945年1月考入译员训练班，直接到抗日前线服务军旅。这样，马来语节目就由李和清编播，直到当年8月抗战胜利，李遂辞职准备回南洋。其职由曾任贵州电台播音员的归国华侨、暨南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林碧藻继任。但林接替不久该节目即奉命停播。

佟德馨播报粤语节目

昆明广播电台先后开播的汉语方言节目有粤语、厦门语、台湾语、沪语节目等，均为动员海外侨胞参加抗战而设置，这里先说粤语节目。

按1940年8月的播音节目表，粤语（广东话）节目应是当年8月1日正式播音时开播，是昆明广播电台最早设立的汉语方言节目，起初称“粤语新闻类述”，每次15分钟，后改为10分钟。最早担任粤语播音的是该台工务员黄石煖之夫人，接着是胡艺超。1942年5月胡离职后，该台遂聘“广州语发音正确，口齿亦尚清晰”的西南联大法律系学生佟德馨继任其职，佟德馨到台后颇能尽职，并未因学业紧张而耽误播音。

1942年12月，军统局侦听得日军在香港的电台（JPH）增加了对重庆的短波广播，中方即作了针对性的部署，1943年

1月21日，中广处一方面急令中央电台增加长波、短波两个广播波段的粤语广播与日方对抗，同时鉴于“中央台中波电力不够强大，未能远及香港”的现状，急令昆明电台“每日增加粤语报告一次，每周至少六次，藉以抵抗香港敌台‘JPH’之虚伪宣传。”这样，昆明电台自1943年2月10日起，每周的粤语播音增加为六次，每次十分钟。因播音员难寻，新增任务自然又落到了佟德馨肩上。而所增广播稿的编选，则请担负厦门语、台湾语播音的联大学生黄曾赐承担。此时，佟德馨在联大法律系就读已是最后一个学期，课业紧张异常，但播音又不能耽误。因此在电台与联大之间两处疲于奔走。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两人均咬紧牙关挺了下来。而该台所能做的，便是上报中广处给两人增加一点微薄的津贴。当年11月，佟德馨因赴重庆参加自费留学考试，曾短期请过假。以后一直在该台工作，1944年7月，昆明电台呈报中广处将佟德馨改聘为专任，称佟“平素颇能遵守时间，认真学习”。这样，佟德馨又工作了8个月，到1945年3月辞职离去。该节目一直办到抗战胜利后。

厦门语播音也属联大学生

1940年10月开播的厦门语节目称为“厦门语新闻类述”，每次10分钟。当年12月改称“厦门语新闻及时评”，自然是增加了评论内容，1944年3月改为“厦门语报告”，每周三次，每次仍为10分钟。该节目开播之初还算顺利，聘得西南联大教育系二年级学生郑韵琴兼任播音员。以后郑辞职，便由台湾语播音员、联大生物系学生黄曾赐兼任该职。黄曾赐是福建闽侯人，工作

颇能吃苦，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辞职。继黄曾赐后担任厦门语播音的为联大土木工程系三年级学生、厦门籍的许四福。许于当年12月辞职后，厦门语播音又延续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停播。

黄曾赐支撑台湾语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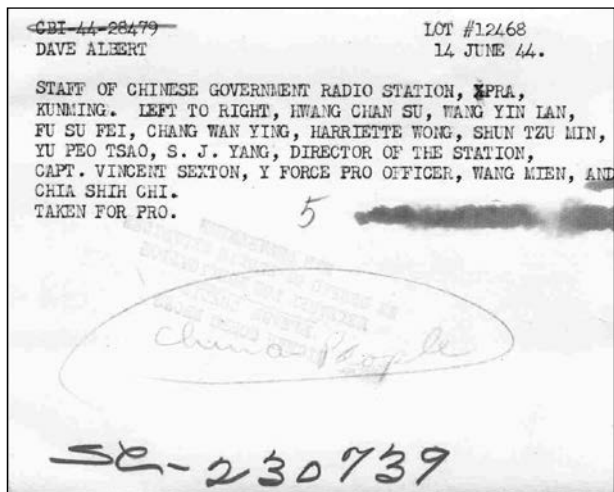
台湾语节目就是台湾方言节目，它和厦门语均属闽南话，该台档案均称为“台湾语节目”。1942年10月，台湾语节目设置之初，由于聘得勤奋能干的联大学生黄曾赐担任播音员，每周三次的播音算是正常进行。但后来大概未能正常播出。1943年3月27日，中广处函令昆明广播电台说：“查台岛被敌割据已久，对岛的同胞之争取利用广播宣传实有必要……如在昆明广播电台广播，岛内同胞可直接收听。”告知设在福建龙溪的台湾省党部，拟派该部黄××至昆明电台担任台湾语播音员，其薪俸由该党部发给。当年12月，中广处再次函令该台，说应台湾党部之求，为加强宣传与播送密码计，便于该党部与岛内通讯，应将台湾语广播增加到每周六次。如此重要之任务，毕业于台湾党部工作人员训练班的黄××应该知其份量，谁想此人到昆明后热衷于该党部活动，对播音之事视同儿戏，几次迟到使节目中断。外语组长沈自敏为此叫苦不迭。该台只好呈报中广处说黄某人“于本台之既定节目殊有妨碍”，请准台湾语节目全部由黄曾赐负责播报。这样，黄曾赐每周要承担厦门语与台湾语共9次的播出任务，可谓劳累异常。台湾语节目大约持续到1944年3月该台实行新节目表时停播，以后未再恢复。

1944年3月，昆明广播电台举办“美

□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1944年6月14日，昆明广播电台“美国陆军音乐节目”中美编播人员合影



照片背面的英文说明

国陆军音乐节目”，慰问在华对日作战的美军，音乐唱片由美军提供。此照片即1944年6月14日，“美国陆军音乐节目”中美双方编播人员在该台播音室合影，原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大卫·艾伯特摄，戈叔亚提供）。笔者据昆明广播电台人事

档案将照片背面的英文说明对照辨认识译出（不是音译），除 Harriette Wong 外，其他人员及职务均已确认（括号内为译者注释文字）：

中国官方昆明无线广播电台（XPRA）职员，自左至右：黄曾赐（台湾语播音员）、王瑛兰（汉语播音员）、傅懋斐（汉语播音员）、张乃映（征集员，即编辑）、Harriette Wong（不详）、沈自敏（外语组长）、虞佩曹（汉语播音员）、杨树仁（第二任台长）、文森特·塞克斯顿（Vincent Sexton）上尉、Y 部队预备役军官、王勉（征集组长，后代理传音科长）、齐璐生（征集员）。

其中，黄曾赐、王瑛兰、傅懋斐、张乃映、沈自敏、虞佩曹、王勉、齐璐生等人均为西南联大毕业生或研究生。

末了要说，吴达元等联大学者为昆明电台外语广播播音之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早些年被作为历史问题多次被追究，每遇政治运动均要检查过关，成为笼罩自身与家人驱不散的阴霾。2005年笔者有关昆明广播电台抗战史实的研究成果开始发表，吴达元等学者致力于抗战外语广播的爱国行为得到肯定。2005年10月14日，北大外国语学院举行“吴达元先生诞辰100周年紀念会”，在会上赠送的《吴达元教授百年诞辰紀念文集》，收入笔者所撰《抗战中昆明电台法语广播探略》一文，自此，吴达元等外语专家背负的政治阴霾被驱散，对此笔者也觉十分欣慰。